

渴望、投资与贫困：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尤 亮 刘军弟 霍学喜

摘要：从理论视角，研究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贫困问题是发展经济学面临的重要挑战；从政策决策视角，推进解决贫困人口的持续贫困问题是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本文聚焦“渴望”—影响贫困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的关键，以渴望与投资关系为主线，建立“渴望—投资—贫困”理论分析框架。依据个体渴望异质性分析的结果，将贫困人口划分为高渴望群体和低渴望群体。针对高渴望群体投资不足行为的约束，本文提出以输血型政策供给突破制约投资不足的外在约束的解决方案；针对低渴望群体的投资不足行为，本文提出以激发型政策供给促使贫困人口由低渴望向高渴望转变，进而提出采用输血型政策供给以促进其投资行为，实现低渴望群体脱贫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渴望 贫困 输血型政策供给 激发型政策供给

中图分类号：F061.6 F32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央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以来，脱贫成效显著，年均脱贫人口超过 1000 万^①。虽然精准扶贫方略强调“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但对贫困人口而言，该方略确立的政策框架依然是一种外援推动式政策。其政策供给可有效突破制约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为脱贫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但难以激发部分贫困人口脱贫的内生动力（左停，2017）。根据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即影响贫困人口发展的外在约束只是制约贫困人口脱贫的外因，而有效激发贫困人口脱贫的“志”、形成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应该是扶贫政策关注的重要方面，以便有效促进缺乏主观脱贫动机的贫困人口摆脱“精准救助”陷阱。但如何激发贫困人口脱贫的内生动力，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放大精准扶贫政策的溢出效应，成为实现长效脱贫的关键（刘永富，2017）。研究表明，激发贫困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需要从突破其内在约束入手（Dalton et al., 2016），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项目“中国苹果产业经济发展研究”（编号:CARS-28）的资助。感谢张炜博士和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霍学喜。

^①参见中共国务院扶贫办党组，2017：《脱贫攻坚砥砺奋进的五年》，<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17/c414305-29590538.html>。

其中，贫困人口的渴望^①是减贫过程中值得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在约束（Flechtner, 2017）。

按照《牛津英语大词典》^②的解释，渴望的一般含义是指取得成就的欲望（desire）、志向（ambition），即为实现某一愿景目标（goals）或具体目标（targets）而付出努力的欲望。研究表明，决策主体在生产生活中显现的资本投资不足行为通常是导致其贫困的直接原因（邹薇、方迎风，2012），且投资不足与贫困间呈现出多重交织与循环态势，而增加投资是打破该循环的重要途径（Knight et al., 2010）。渴望作为决策主体的内生动力因素会促进其资本投资行为（Bernard et al., 2014）。这为依据渴望理论探讨、解决贫困人口脱贫及发展动力机制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从理论上讲，高渴望会促进较高的资本投资水平，低渴望会导致较低的资本投资水平。但现实中，贫困人口渴望与投资关系的表现与理论间存在差异。那么，对贫困人口中的高渴望群体而言，其投资不足的外在约束是什么？对贫困人口中的低渴望群体而言，如何有效促进其由低渴望群体向高渴望群体转变？针对贫困人口中的高渴望群体和低渴望群体，应该如何优化精准扶贫政策供给方案？这些问题均需要结合中国精准扶贫情境，构建系统的“渴望—贫困”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的精准脱贫攻坚战聚焦解决贫困人口的物质匮乏和生活保障问题，究其本质，从根源上消灭贫困，实现脱贫后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关键。实现贫困人口发展必须借助外来援助，但在根本上要注重激发贫困人口的渴望，以形成内生发展动力机制。以激发渴望为导向的扶贫政策，注重发挥贫困人口在减贫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促进贫困人口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转变，从而有效减少外援推动式扶贫政策的压力和摩擦。本文首先界定“渴望”概念，并探讨贫困人口渴望的异质性及其原因，这是从渴望影响的视角识别贫困人口致贫类型的前提。其次以渴望与投资关系为主线，建立“渴望—投资—贫困”理论分析框架。再次针对贫困人口中的高渴望群体，探讨制约其投资行为的约束因素，设计输血型导向型政策供给方案；针对贫困人口中的低渴望群体，研究激发型政策供给方案，促进其渴望转型。最后是结论与讨论。

二、渴望及其异质性

（一）渴望及定义

渴望源于心理学家 Dembo（1976）在“愤怒”实验研究中定义的“渴望水平”^③。在经济学领域，“渴望”出自 Simon 的“满意”评价方法（参见 Simon, 1955）。Simon（1955；1979）认为，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存在信息处理成本的情况下，决策主体只具备有限的认知和信息处理能力，即在不确定

^①据汪丁丁（2011）考证，“aspiration”源自拉丁文“aspiratio”，是一种积极追求的欲望，其法文的意思是“憧憬”、“向往”、“渴望”。汪丁丁将其译作渴望。

^②*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1989, <http://dictionary.oed.com/>.

^③为唤起实验对象的沮丧和愤怒情绪，要求实验对象从事非常困难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表明，在实验对象判断任务难以完成时，会主动调整并制定适中的目标。经调整的过渡性目标相对容易达到，但其行为动机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即向原有的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前进。Dembo（1931/1976）将这种过渡性目标定义为“渴望的短暂水平”。

定条件下，决策主体行为仅具有有限理性特征。Simon 将有限理性人做出决策的过程定义为，决策主体在能够搜寻到的替代性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如果该选择能够满足或超出决策主体的渴望水平，则该选择即为“满意”的选择，即“满意”的衡量标准为渴望水平。然而，Simon 并未对渴望给予进一步解释。此外，在经济学发展中并没有对渴望予以充分重视，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学中已存在“偏好”等类似渴望的表达，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学领域尚未形成测量渴望的有效方法。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和行为经济学对微观行为研究的重视，经济学界逐渐重视与渴望相关的研究，但就渴望的内涵而言并未达成一致。Ray (2006) 将个体依据对周围人的观察而形成的欲望 (desire) 定义为“渴望”，即渴望是由社会决定的一种特殊的欲望。Dalton et al. (2016) 将“渴望”与“目标” (goal) 视为等同概念，认为渴望具有个体偏好内涵。Genicot and Ray (2017) 在“阈值”附近定义效用，“阈值”类似于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此处的“阈值”即为渴望，并且他们认为渴望会激励个体去投资以实现目标，渴望实现意味着目标实现，即他们同样将渴望与目标视为等同概念，但强调渴望同时由个体经验和个体周围的环境决定。Bernard and Taffesse (2014) 侧重于渴望的未来导向性，认为渴望会驱使个体为实现目标 (goals) 而投入时间、努力或金钱，并强调渴望不同于偏好、信念 (beliefs)、期望 (expectations)。Bernard et al. (2014) 认为渴望可以作为个体偏好的边界，是个体认为自身所能获得的最佳选择，而且渴望驱动着人们的决策和行为。Appadurai (2004) 从能力视角定义渴望，认为个体的渴望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在既定的天赋、兴趣、机会和约束条件下个体探索未来的元能力。渴望也是一种领航能力，使得个体能够识别的直接或间接目标，使其着眼于未来和发展的行为方式进行决策。

综上所述，本文将渴望定义为决策主体以未来可能实现的目标为导向，识别能够激发和引导自身行为的最佳选择的能力，这种能力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决策主体的经历和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二) 渴望的异质性

渴望作为个体的内在特征在社会情境中并非是平均的或同一的，即同一情境中和不同情境中的个体间存在高渴望和低渴望类型。渴望的社会学属性意味着渴望的指向可以是资产、收入等物质性渴望，也可以是婚姻、生育、幸福、平等等社会性渴望。本文关注渴望与脱贫的关系问题，因而尤其关注渴望的收入指向性。

渴望的异质性可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中找到理论依据。人类学家强调渴望是个体不易改变的能力，而社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则侧重于外在环境对渴望的形塑影响，但均为依据渴望对贫困人口进行分类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类学家将渴望视为个体元能力和领航能力 (Appadurai, 2004)。从元能力视角分析，通常相对富裕、社会地位较高、有权势的个体的元能力更加完善，而相对贫困、社会地位较低、缺乏影响力的个体则相反。从领航能力视角分析，贫困人口缺少在实践、重复和探索中不断得到发展领航能力的机会，导致其领航能力培养受限。对贫困人口而言，这一观点蕴含宿命论成分，

忽视了个体所具有的社会学习能力。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①是个体渴望的重要来源（Dercon and Singh, 2013）。个体自我效能感来源于“替代性经验”和“劝说”。即个体的渴望会因周围背景相似的人通过持续努力获得成功或周围人的积极劝导性建议而提升；相反，个体的渴望会因周围背景相似的人的失败或周围人的消极劝导性建议而降低。可见，社会情境中的其他群体对个体渴望具有重要影响。类似地，经济学家 Ray（2006）将个体能够观察并感知的与自己背景相似人群的集合定义为“渴望窗口（aspirations window）”，渴望窗口决定着个体渴望的形成及演变，其实质是为个体的渴望提供一个可能性边界。个体渴望窗口的变化会导致其渴望变化。当个体的渴望窗口较宽时，其渴望往往较高；当个体的渴望窗口较窄时，其渴望往往较低。现实中，个体所在社会环境中的社会流动性、信息流动性、人口流动性等均会对个体的渴望窗口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个体的渴望。可见，该观点强调个体所在社会环境的特征对个体渴望的重要影响。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个体的渴望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特征，且深受决策主体的自身经验和所处环境内其他个体行为的影响，即个体禀赋和经历及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孕育着个体的渴望，因而决定了个体间渴望具有异质性。贫困人口属于低收入人群，个体间渴望同样存在异质性，可分为低渴望群体和高渴望群体。Bandura（1997）的“替代性经验”与 Ray（2006）的“渴望窗口”表明，个体生存的社会环境会间接影响其渴望。值得关注的是，自我效能感来源中的“劝说”效应表明，可以通过直接干预来提高贫困人口中低渴望群体的渴望。那么，社会环境的间接影响和直接的干预措施通过何种机制才能有效激发贫困人口中低渴望群体的渴望，就是重要理论问题。

三、渴望、投资与贫困

纵观人类发展史，无不在寻找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和方法（Brunner, 1985），其中，发展经济学界在该领域的探索值得关注。发展经济学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强调资本匮乏或投资不足到强调制度分析层面和从宏观秩序到微观决策层面的发展过程。事实上，任何经济理论如果缺少以现实为基础的微观个体决策分析，都将导致对其可信度的质疑（Arrow, 1994）。因此，立足于制约贫困人口投资决策行为的微观个体分析，才有助于探索形成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具体贫困问题的途径（Banerjee and Duflo, 2012）。具体到本文研究，制度因素是个体贫困的间接原因，具有相对外生性；而个体资本投资不足则是导致其贫困的直接原因。研究表明，较高的资本投资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关键（高玉喜，1996；刘林等，2016），而渴望能够激发贫困人口的资本投资行为。因此，建立“渴望—投资—贫困”分析框架，是基于渴望理论研究解决贫困问题的基础。

（一）个体资本的投资不足导致贫困

贫困人口的投资不足是导致其贫困的重要原因，且具有内生性。根据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

^①自我效能感来自于社会学习理论，是指决策主体对其是否有能力在某个领域有效完成任务、实现具体目标的信念（如达到某一收入水平的信念）（Bandura, 1977）。个体的自我效能感的四种来源分别为其成败经验或运作的成就、替代性经验、劝说和情绪触发（Bandura, 1997）。

论，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因素间存在着相互推动作用。当某个因素发生变化时，会通过经济社会对另一个因素产生作用，而这种作用又会进一步加强原来的作用效果，即投资不足→贫困→投资不足，进而形成一种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而提高投资水平是打破这种因果循环链条的关键。依据资本形式的差异，本文将投资划分为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三种类型。

从人力资本视角展开研究的学者，较多关注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对贫困的影响。受教育年限是衡量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指标。劳动者前期所支付的教育成本，会通过劳动者后期的收入分配得到补偿，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工资水平就越高（雅各布·明塞尔，2001）。与成本较低的人力资本投资项目相比，成本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项目的年回报率更高，但收益时间会延迟（Carneiro and Heckman, 2003）。人力资本投资的目标在于促进掌握知识和提高生产率。若将家庭当作一个生产单位，把子女当作产品，则父母养育子女、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经济行为（加里·贝克尔，1987），它影响贫困家庭贫困的深度和持续时间（周强、张全红，2017），并且具有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郭晓娜，2017）。健康可看作一种持久的人力资本存量，不仅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还能够延长劳动者从事市场和非市场活动的时间总量（Grossman, 1972）。研究发现，营养摄入不足和疾病影响贫困人口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其摆脱贫困（张车伟，2003）。健康冲击会加重贫困人口的脆弱性（方迎风、邹薇，2013），并且健康的代际影响会降低子代的收入水平，可能诱发陷入“恶性贫困循环”的风险（洪秋妹，2010）。从收入差距缩小视角看，健康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比教育更为显著（程名望等，2014）。因此，无论是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还是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均对贫困人口脱贫具有重要作用。

物质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对于个体摆脱贫困、实现收入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如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梦滔、姚洋，2006）；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既能促进生产要素的配置及农产品的流通，也有助于竞争性市场的发育，对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Hearn et al., 1990; Komives et al., 2000）。物质资本对农户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程名望等，2015），在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方面发挥了直接作用，在短期内可有效助推贫困人口摆脱困境（黄英君等，2011）。但物质资本投资对减贫效果的影响，往往因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状况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刘晓均等，2003）。

社会资本日益成为影响个体收入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不仅是维持社会运转与协调个体间利益的非正式契约，而且是信息分享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替代机制（Bowles and Gintis, 2002）。在贫困地区，社会资本能够起到非正式担保机制的作用，并降低贫困家庭的信贷约束（朱建军、常向阳，2010），能够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实现农户的福利改善，有助于降低农户落入“贫困陷阱”的概率（张爽等，2007）。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比较贫瘠的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穷人资本”功能，对减轻贫困具有显著作用（叶初升、罗连发，2011）。周晔馨、叶静怡（2014）的综述结果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减弱的趋势。

可见，无论是物质资本投资还是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对于减轻个体贫困均具有重要作用。而且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影响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间接地增加个体收入（李清政等，2014）。

（二）渴望会促进个体的资本投资行为

贫困人口的渴望是脱贫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Pasquier-Doumer and Risso Brandon, 2015），是形成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机制的关键，原因是渴望会影响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水平^①。即低渴望会导致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水平较低，进而可能陷入贫困陷阱；而贫困人口中的高渴望群体，在不存在外在约束的情境中往往表现出较高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水平。

在渴望与决策主体资本投资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领域，而对渴望与决策主体社会资本投资关系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就资本投资的目标而言，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间具有一致性。因而本文以渴望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资关系为例。

围绕渴望与决策主体人力资本投资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渴望与教育渴望方面。Stout et al. (2011) 的实验表明，通过展示成功女性科学家的照片和录像，可以提高美国女性微积分学员的职业渴望和学习动机，促使其在微积分学习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Beaman et al. (2012) 基于印度男性主权社会特征和贫困村庄治理情境，围绕梳理女性角色榜样，在案例村委会随机为女性分配职位。结果显示，实验可有效缩小当地女孩与父亲间在女孩职业渴望上的性别差异，而且能诱导女孩减少在日常家务方面花费的时间，青少年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消失。Jensen (2012) 的实验发现，印度贫困村庄的女性在参观电话呼叫中心后，其职业渴望得到提高，其职业培训参与程度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显著增加，且延迟了女性的结婚年龄和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时间。Pasquier-Doumer and Risso Brandon (2015) 对秘鲁原住民与移民后裔间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发现，由于低渴望，处于社会经济劣势地位的原住民对教育投资过低，并导致原住民陷入严重的代际贫困陷阱。Wydick et al. (2013) 对一项涉及六国的国际儿童援助计划的效果评估发现，受到援助儿童的教育渴望显著高于非受援儿童，主要原因是集中提供学术指导、精神指导、健康护理援助等可提高参与儿童的教育渴望，而且教育渴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受援者的受教育年限、不同学业阶段的学业完成率以及成年阶段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在渴望与贫困人口物质资本投资关系研究方面，Macours and Vakis (2009) 针对尼加拉瓜贫困地区缺乏社会流动性及阶层固化的情境所进行的随机转移实验发现，加强实验参与者与具有成功经验领导者间的社会互动，能够有效激发贫困参与者的渴望，进而带来贫困参与者家庭生产性投入的增加。相反，与具有成功经验领导者社会互动较少的贫困家庭的渴望较低，其生产性投入较低，并处于持续贫困状态。Bernard et al. (2014) 按照实验组、安慰剂组、控制组设计模式，在埃塞俄比亚贫困地区开

^①渴望对个体行为的激发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能找到相似的表达，如谚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而授人以渔不如授之以欲”中的“欲”与渴望的描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句谚语的前者强调的是传授给人既有知识，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而后者强调的是传授方法不如激发欲望，将被动转化为主动，培育和形成内生性发展的动力机制。即鱼是目的，钓鱼是手段；鱼是结果，而渔是根植于渴望吃鱼的理念与方法。如果想要持续有鱼吃，就要学会甚至创新钓鱼的方法。“欲”就是植根于内心的渴望，时时处处影响着个体的资本投资决策。

展关于渴望与未来导向行为的干预实验发现，角色榜样可以显著提高实验组的渴望，且渴望具有持续性。同时，在考虑时间偏好、风险偏好、同群效应等因素的基础上，他们清晰验证了实验组投资行为的改变，源于其渴望的提高。其他相关文献也显示，缺乏有效激发渴望的情境，会影响贫困家庭长期生产性借贷意愿、信贷需求和投资激励，也会影响贫困家庭的储蓄和投资规划（Bernard et al., 2012; Janzen et al., 2017; Genicot and Ray, 2017）。

以上研究表明，渴望是贫困人口资本投资行为的内生激励因素，渴望能够调动和引导贫困人口的欲望、动机、需要转化为行为，驱使着贫困人口为努力实现渴望而增加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的投资。换言之，高渴望会激励贫困人口较高的资本投资水平，低渴望会导致贫困人口较低的资本投资水平。但贫困人口较高的资本投资水平能促使其摆脱贫困，较低的资本投资水平则会妨碍其摆脱贫困陷阱。因此，建立“渴望—投资—贫困”分析框架，对深入研究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四、贫困人口投资不足：外在约束与渴望激发

依据前文对个体渴望异质性的讨论及“渴望—投资—贫困”分析框架，具有高渴望的决策主体的资本投资水平通常较高，因而不会陷入贫困。但现实中贫困人口中的高渴望群体依然可能会陷入贫困，其根源在于贫困人口行为决策受到一些外在约束的影响，进而导致其资本投资水平不足。对这类群体，需要通过输血型政策供给来突破制约贫困人口资本投资的壁垒。对贫困人口中的低渴望群体而言，输血型政策供给通常治标不治本，因而首先需要有效激发这类群体的渴望，即采用激发型政策供给来提高其渴望。在渴望提高的基础上，采用输血型政策供给，才能有效破除贫困，并实现贫困人口脱贫后的可持续发展。

（一）高渴望群体资本投资不足：解除外在约束

对贫困人口中的高渴望群体而言，其决策所面临的外在约束是抑制该类型贫困人口资本投资不足行为的重要因素。包括个体投资来源限制导致较少的投资（Kochar, 1997），信用及保险市场不健全（Ahsan et al., 1982），权利贫困制约（阿马蒂亚·森，2001），制度或政府政策失灵衍生的官僚体制、腐败导致的投资机会限制（Bardhan, 1997），贫困地区邻里间长期、反复的负面影响导致的集体行为意识负向激励（如轻视教育投资）（Sampson and Morenoff, 2006），以及社会契约属性的亲属制度（kin system）对个体进入现代部门的不利影响和经济转型中亲属制度导致其成员掉入贫困陷阱（Hoff and Sen, 2006）。贫困人口通常需要大量观察成功的案例才做出决定，但较高回报率的投资决策极易受到信息、知识的制约而流产（Yamauchi, 2007）。此外，外在约束既可能独立于市场机制而影响个体的理性决策，也可能伴随着市场失灵而抑制投资机会对个体的吸引力，如平等主义规范（Platteau, 2006）、政府过多赋税和过度规制（Hausmann et al., 2008）均具有社会约束特征。在这种情境中，高渴望群体即使面对资本投资回报较高的机会，也会因面临与他人分享而影响其努力的积极性，导致资本投资不足。

从微观视角研究贫困人口中高渴望群体行为决策面临的外在约束及其对资本投资不足行为的影响，深化和丰富了对贫困致因的理解。制约贫困人口行为决策的外在约束因素众多，既涉及制度和政

策，又涉及社会保障和社会规范。因此，政府通过输血型政策供给有助于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对贫困人口的渴望类型进行有效识别至关重要，政府的输血型政策供给仅对高渴望群体有积极效果，即只有对具有内生发展动力的贫困人口，破除制约其资本投资行为的外在约束，才能够助力其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以本文研究团队成员 2016 年在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太白县调研为例，当地政府在脱贫攻坚中采用了诸多破除制约贫困人口发展外在约束的办法。包括为贫困人口发放专项扶贫资金、提供贴息贷款和互助资金等解决贫困人口资金来源的问题；开通系列技术信息服务平台，提供政策、技术、营销等信息，扶持解决贫困人口的信息约束；完善村规民约，破除互相攀比、铺张浪费、家族主义等陈规陋俗，以削弱邻里效应的负面影响等。这些举措均具有破除制约贫困人口资本投资的外在约束的特征与功能，能够帮助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输血型政策供给主要以村镇为试点单元，难以细化到个体，且仅对贫困人口中的高渴望群体有效，因而缺乏精准性。

（二）低渴望群体的投资不足：渴望激发机制

研究发现，即使在不存在外在约束的情境中，贫困人口也会存在资本投资不足行为，其根源在于贫困人口的低渴望。Miguel and Kremer (2003) 对肯尼亚儿童健康管理的研究发现，在 NGO 免费提供打虫药及相关服务（涉及儿童健康管理、入学率及学业表现的重要人力资本投资项目）给当地儿童的情境中，该服务的实际使用率仅为 57%；NGO 针对印度孟加拉邦开展的提高极端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资产援助（如，家畜）及相关培训项目，研究人员发现，尽管预期收益很高，但随机抽取的个体中仍有 35.6% 拒绝接受援助 (Banerjee et al., 2011)。同样，NGO 为肯尼亚布希亚地区的农民提供了价格合理的高效化肥并告知其如何使用及高达 70% 的投资回报率，但高效化肥的使用率仍很低 (Duflo et al., 2011)。对低渴望群体而言，打破外在约束的输血型的收入补助、福利政策措施并不能彻底消除贫困。原因是这些措施会产生替代效应，部分贫困人口会因此形成心理依赖，产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阻碍贫困人口形成内生性的脱贫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可以减贫，但一旦终止这些外援性援助项目、资金撤销，贫困人口又可能返贫，进而形成损失厌恶心理机制，破坏贫困人口的投资积极性。这正是安格斯·迪顿 (2014) 反对富国直接援助贫国的原因，因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直接援助会破坏个人的能力发展。因此，对贫困人口中的低渴望群体而言，如何有效激发其渴望，实现低渴望群体向高渴望群体转变，是该类群体脱贫的关键。

关于渴望对个体资本投资行为的研究发现，树立社会榜样、提升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公共项目参与度等举措，通过社会比较、社会互动机制，可以有效激发贫困人口的渴望，进而影响其资本投资行为。

1. 渴望激发机制：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个体的经济活动与生计行为都深度融入社会网络，其社会心理和行为特征，特别是观点、能力等需要通过比较、凝练而形成定义，而不是依托单纯的客观标准来定义，这种基于个体内在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获得个体社会特征的方式被定义为社会比较 (Festinger, 1954)。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比较是渴望形成的重要基础 (Quaglia and Cobb, 1996; Stutzer, 2004)。具体来说，为贫困人口树立与其背景相似的成功人士作为社会榜样，若社会榜样的成

功经验能够被贫困人口所认同，则这种社会榜样可纳入贫困人口的渴望窗口，其行为结果成为贫困人口调整渴望的依据。即贫困人口可通过社会比较机制拓宽其渴望窗口，提高其渴望。此外，通过提升贫困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增强其自信心，同样有助于拓展贫困人口的可比较范围，提高其渴望。

社会互动即非市场互动，是指不受市场机制调节的、不同个体间相互影响。社会互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外部性，即在参照群体与贫困人口互动的过程中其渴望、行为结果、外在特征对贫困人口的渴望产生影响。参照群体的确定依赖于贫困人口所处环境，如家庭成员、朋友、邻居和所在群体等（Glaser and Scheinkman, 2000；陆铭、张爽，2007）。根据社会互动理论（参见 Manski, 2000；何兴强、李涛，2009），将社会互动对贫困人口渴望的影响分为三类：内生互动、情景互动和关联效应。内生互动强调贫困人口的渴望会受到其参照群体成员同期渴望的影响，且可以反作用于参照群体的成员，如别人提高渴望，我也提高渴望；我的渴望提高，别人的渴望也受到影响。情景互动强调行为的“结果示范”效应，即贫困人口的渴望受参照群体成员行为结果的影响，但其渴望并不能反作用于参照群体成员。情景互动使贫困人口了解了更多的渴望与收入间关系的结果，贫困人口认为“结果较好”时“结果示范”效应为正，反之为负。关联效应指由于具有相似的个体特征或者面临相似的生活环境，贫困人口和参照群体间表现出来的渴望相似性。贫困人口在公共项目的参与中，通过与参照群体互动，参照群体的渴望、行为结果、外在特征都会对贫困人口的渴望产生影响，且参照群体的积极性劝导对贫困人口渴望的影响具有直接性。

2.渴望激发措施：政策供给。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凡能够激发贫困人口的渴望，促进其由低渴望向高渴望转变的政策供给，应该归类为激发型政策供给。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发型政策以提高低渴望群体的渴望，这需要根据低渴望群体的特征有针对性地采取对应措施。

从整体视角看，依据低渴望群体的空间聚集度及低渴望的时间持续性，将低渴望群体划分为四种类型：

（1）低渴望贫困人口集中度低且持续时间短。对这一类型的低渴望群体，因集中度低，周围高渴望或非贫困群体较多且存在与这一类型群体背景相似的群体，从中可以较容易选出社会榜样。同时，低渴望持续时间短，实现低渴望向高渴望转变相对较易。在这种情境下，让社会榜样讲述其发展经历，发挥“示范户”的正外部性，通过社会比较机制，激发这类群体的渴望。此外，基层政府或村委会开展脱贫经验交流会，通过社会互动机制，也可以激发这类群体的渴望。

（2）低渴望贫困人口集中度高但持续时间短。该类型群体的出现多因一些外部冲击所致，如当地经济发展对资源依赖较强或产业结构单一，但因市场、政策等因素改变导致原有的优势不复存在等。对该类型群体，政府通过政策扶持以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提高信息流动性和人口流动性，促进地区间的交流与比较，实现群体的渴望转变，进而寻找新的发展出路。政府也可以设计物质激励情境，鼓励该类型群体自主寻找出路，通过“先富带后富”，实现这类群体渴望的提高。此外，开展教育培训，引导并培育新的发展理念，通过社会互动，同样可以实现该群体的渴望转变。

（3）低渴望贫困人口集中度低但持续时间长。该类型群体低渴望持续时间长，其渴望较难转变。对该类型群体，通过“脱贫进步榜”激励举措，使之意识到其处境，促进其积极的社会比较意识。此

外，通过成立脱贫互助组，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扶贫示范园、产业扶贫试点企业等发展平台吸纳该类型群体参与，均能在社会互动机制的作用下，提高其渴望。

(4) 低渴望贫困人口集中度高且持续时间长。该类型群体多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对该类型群体，通过政策扶持实现整体异地搬迁提升其较为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等举措，促进其与外界社会的比较，激发其渴望。此外，通过对该类型群体输入市场经济发展理念，改变其消极的生活理念，同样可以激发其渴望。不同类型低渴望群体的渴望激发措施见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类型低渴望群体的渴望激发措施

| | | 低渴望贫困人口集中度 | |
|-------------|---|--------------------------------|---|
| | | 低 | 高 |
| 低渴望 持续时间 | 短 | ①树立社会榜样，发挥“示范户”正外部性；②经验交流会等。 | ①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信息流动性、人口流动性；②物质激励；③教育引导等。 |
| | 长 | ①“脱贫进步榜”激励；②脱贫互助组；③组织、产业发展平台等。 | ①异地搬迁；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经济地位；③输入市场经济理念，移风易俗等。 |

从个体视角看，在扶贫工作中低渴望群体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①享受到被帮扶带来的益处，以贫困户身份为荣。②本身能够勤劳致富，但缺少吃苦耐劳精神，而甘于贫困，存在“等、靠、要”的懒惰思想。③有脱贫的动机，但畏难情绪严重，缺乏行动力或遇到困难就放弃。对于这三种类型的低渴望群体要转变传统的外援推动式的扶贫方式。对于第一种和第二种类型的贫困群体，有必要在思想观念上进行教育引导，进而通过“脱贫进步榜”激励、树立社会榜样等举措提高该类型贫困群体的社会比较意识，提高其渴望。对于第三种类型的贫困群体，可以通过开展经验交流会、脱贫互助组等举措促进该类型贫困人口与周围人社会互动，提高其渴望。

值得关注的是，渴望与经济发展不平衡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如东部和西部地区间显著的经济差异，导致西部成为东部的初级产品供应地、制成品的销售地；城乡之间、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影响低收入群体的渴望。原因是在收入阶梯陡峭和缺乏收入流动性的两极分化社会中，由于贫困人口与高收入阶层间缺乏可比性，因而其渴望窗口不包含高收入阶层，从而会抑制贫困人口的渴望 (Ray, 2006)。但经济不平衡增长在短期内能够激发低收入群体的渴望 (Hirschman and Rothschild, 1973)。如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在短期内会激发低收入群体的渴望，这也是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往往快于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的重要原因，但持续的收入差距扩大则抑制低收入群体的渴望。因而，政策供给也应该着力控制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以便形成持续激发低收入群体渴望的发展情境。

五、结论与讨论

(一) 渴望视角的贫困解决路径

本文首先以个体渴望异质性分析为基础，将贫困人口划分为高渴望群体和低渴望群体。其次将个体资本投资作为渴望影响贫困的作用机制，构建“渴望—投资—贫困”分析框架。研究发现，高渴望

会诱导较高的资本投资水平，而且较高的资本投资水平有助于促进个体收入增长，促进个体可持续发展。低渴望会导致较低的资本投资水平，进而导致个体陷入贫困。最后，针对贫困人口中的高渴望群体在资本投资方面面临的约束条件，本文认为通过完善输血型政策供给，优化贫困地区的投资环境，有效破解制约资本投资的外在壁垒，助力高渴望群体实现精准脱贫。针对贫困人口中的低渴望群体的投资行为特征，建议重视激发型政策供给，并在促进其实现由低渴望群体到高渴望群体转变的条件下，进而完善输血型政策供给，助力低渴望群体脱贫。渴望视角的贫困解决路径见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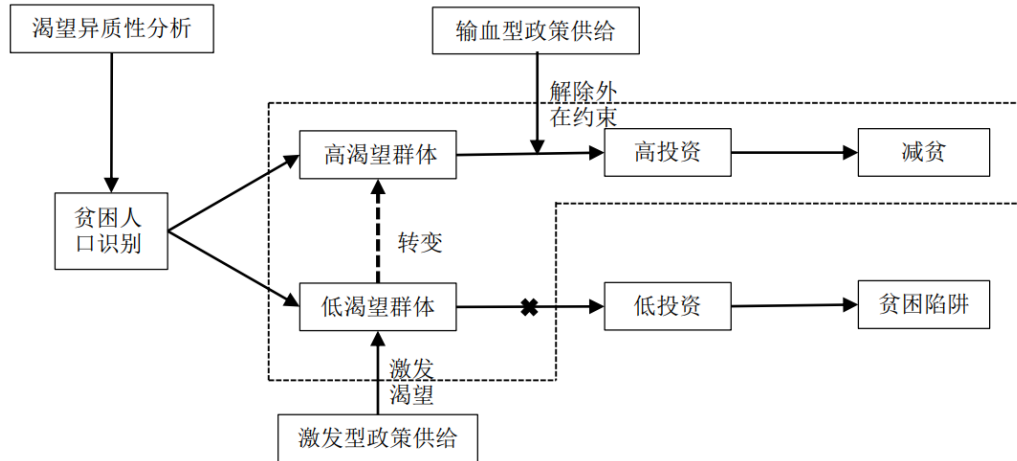


图 1 渴望视角的贫困解决路径

（二）适度渴望与贫困人口理性投资行为

渴望是影响贫困人口资本投资行为的内生激励因素，渴望能够调动和引导贫困人口的能量转化为行为，驱使着贫困人口为努力实现渴望而加大资本投资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人口的渴望越高越好，渴望过高或过低均不能有效激发贫困人口的资本投资行为。

贫困人口的渴望形成后，其渴望的收入水平与当前已经达到的收入水平的差额称为“渴望差距”（aspirations gap），贫困人口的渴望差距决定其资本投资水平的高低（Ray, 2006）。贫困人口的渴望差距在很小或很大时，其资本投资水平提高并不明显。当贫困人口的渴望差距很小时，其渴望的收入水平和自身当前的收入水平接近，渴望对提升当前收入水平的激励很小，不足以诱导贫困人口增加投资；当贫困人口的渴望差距很大时，其渴望和自身收入现状相差太大，同样导致激励很小，因为实现渴望难度太大，缩小渴望差距对贫困人口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大量资本投资只能缩小一点差距，因而显得不值得。特别是，贫困人口本身就不具备筹措充足资本的条件。此外，渴望过高可能会导致贫困人口非理性的物质资本投资行为，如投资资产专用性很强农业生产设备等；长期的低渴望会导致贫困人口陷入持续性贫困。因此，贫困人口的渴望处于在一个适度的范围才能对资本投资行为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

（三）进一步讨论

中国政府启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的扶贫实践表明，促进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并不能仅注重解决制约贫困地区发展、贫困人口投资不足的外在约束问题，还应该注重激发贫困人口的低

渴望问题。对部分贫困人口而言，突破外在约束只是治标而非治本的举措。依据渴望理论，具有更高渴望的贫困人口更有可能做出成本较高但投资回报较高的决策。因此，理解和把握制约激发贫困人口渴望的因素，研究有效激发贫困人口渴望的解决方案和措施，才能做到对症下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贫困既不能归因于个体的懒惰，也不能完全归因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对系统解决如此复杂的贫困问题，必须注重整合各种力量参与到脱贫攻坚战中。本文研究团队成员在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调研过程中发现，政府主导的外援推动式扶贫仍然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缺乏社会力量的参与，更为重要的是忽视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和村庄异质性。在扶贫攻坚过程中，政府政策支持是外在力量，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渴望并为此付出的努力才是内在力量。因此，政府应重视贫困人口发展中面临的外在约束和内生动力缺乏问题，精准施策，破解制约高渴望群体的外部约束，采取教育、引导、激励并重的手段，激发低渴望群体的渴望，形成激励低渴望群体自我发展奔小康的良好环境。社会作为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意识功能的有机体，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力量。社会团体应注重引导贫困人口的理性发展观、理性市场行为观和理性收入观的价值观导向，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帮助贫困人口打开渴望窗口，激发贫困人口的渴望。可见，在城乡社会变革和集中连片特困区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注重整合各种力量，重视发挥贫困人口、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间的联动作用，形成合力，进而彻底消灭贫困。

参考文献

- 1.阿马蒂亚·森，2001：《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安格斯·迪顿，2014：《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崔传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3.程名望、Jin Yanhong、盖庆恩、史清华，2014：《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经济研究》第11期。
- 4.程名望、史清华、Jin Yanhong、盖庆恩，2015：《农户收入差距及其根源：模型与实证》，《管理世界》第7期。
- 5.高梦滔、姚洋，2006：《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经济研究》第12期。
- 6.高玉喜，1996：《中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管理世界》第5期。
- 7.郭晓娜，2017：《教育阻隔代际贫困传递的价值和机制研究——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3期。
- 8.方迎风、邹薇，2013：《能力投资、健康冲击与贫困脆弱性》，《经济学动态》第7期。
- 9.何兴强、李涛，2009：《社会互动、社会资本和商业保险购买》，《金融研究》第2期。
- 10.洪秋妹，2010：《健康冲击对农户贫困影响的分析——兼论健康风险应对策略的作用效果》，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1.黄英君、苗英振、蒋径舟，2011：《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回顾、反思与展望——基于社会资本投资的视角》，《探索》第5期。
- 12.加里·贝克尔，1987：《人力资本》，梁小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3.李清政、刘天伦、陈子夏，2014：《社会资本视角下家庭增收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宏观经济研究》第1期。

- 14.刘林、李光浩、雷明, 2016:《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以2011—2014年新疆南疆三州为例》,《经济科学》第3期。
- 15.刘晓均、辛贤、毛学峰, 2003:《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
- 16.刘永富, 2017:《不忘初心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成就与经验》,《求是》第11期。
- 17.陆铭、张爽, 2007:《“人以群分”:非市场互动和群分效应的文献评论》,《经济学(季刊)》第3期。
- 18.汪丁丁, 2011:《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雅各布·明塞尔, 2001:《人力资本研究》,张凤林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 20.叶初升、罗连发, 2011:《社会资本、扶贫政策与贫困家庭福利——基于贵州贫困地区农村家户调查的分层线性回归分析》,《财经科学》第7期。
- 21.张车伟, 2003:《营养、健康与效率——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证据》,《经济研究》第1期。
- 22.张爽、陆铭、章元, 2007:《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第2期。
- 23.周强、张全红, 2017:《中国家庭长期多维贫困状态转化及教育因素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4期。
- 24.周晔馨、叶静怡, 2014:《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的作用: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南方经济》第7期。
- 25.朱建军、常向阳, 2010:《村庄社会资本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26.邹薇、方迎风, 2012:《中国农村区域性贫困陷阱研究——基于“群体效应”的视角》,《经济学动态》第6期。
- 27.左停, 2017:《乡土资源、知识体系与精准脱贫的内源扶贫机制》,《改革》第10期。
- 28.Ahsan, S. M., A. A. G. Ali, and N. J. Kurian, 1982, “Toward a Theory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4(3): 510-529.
- 29.Appadurai, A., 2004, “The Capacity to Aspire: Culture and the Terms of Recognition”, in Rao, V., M. Walton (eds.), *Culture and Public Action*, Redwo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30.Arrow, K. J., 1994,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Knowled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 1-9.
- 31.Bandura, A., 1977, “Self-efficacy: Towards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3): 191-215.
- 32.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Freeman.
- 33.Banerjee, A., and E. Duflo, 2012,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34.Banerjee, A., E. Duflo, R. Chattopadhyay, and J. Shapiro, 2011, “Targeting the Hard-core Poor: An Impact Assessment”, Working paper, <http://economics.mit.edu/files/6645>.
- 35.Bardhan, P., 1997,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Issu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3): 1320-1346.
- 36.Beaman, L., E. Duflo, R. Pande, and P. Topalova, 2012, “Female Leadership Raises Aspiration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Girls: A Policy Experiment in India”, *Science*, 335(6068): 582-586.

37. Bernard, T., S. Dercon, K. Orkin, and A. S. Taffesse, 2014, "The Future in Mind: Aspirations and Forward-looking Behaviour in Rural Ethiopia", CSAE Working Paper, <https://www.economics.ox.ac.uk/materials/papers/13772/csae-wps-2014-16.pdf>.
38. Bernard, T., and A. S. Taffesse, 2014, "Aspirations: An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with Validation Using Ethiopian Dat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3(2): 189-224.
39. Bernard, T., S. Dercon, and A. S. Taffesse, 2012, "Beyond Fatalism: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Self-efficacy and Aspirations Failure in Ethiopia", ESSP Working Papers 46, <https://ideas.repec.org/p/fpr/esswp/46.html>.
40. Bowles, S., and H. Gintis,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112(483): 419-436.
41. Brunner, K., 1985, "The Poverty of Nations", *The Cato Journal*, 5: 37-50.
42. Carneiro, P. M., and J. J. Heckman, 2003, "Human Capital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9495, <http://www.nber.org/papers/w9495>.
43. Dalton, P. S., S. Ghosal, and A. Mani, 2016, "Poverty and Aspirations Failure", *The Economic Journal*, 126(590): 67-80.
44. Dembo, T., 1976, "The Dynamics of Anger", in De Rivera J.(ed.), *Field Theory as Human-science*, New York: Gardner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1).
45. Dercon, S., and A. Singh, 2013, "From Nutrition to Aspirations and Self-efficacy: Gender Bias over Time among Children in Four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45(5): 31-50.
46. Duflo, E., M. Kremer, and J. Robinson, 2011, "Nudging Farmers to Utilize Fertilizer: Theory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Keny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6): 2350-2390.
47. 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7(2): 117-140.
48. Flechtner, S., 2017, "Should Aspirations Be a Matter of Policy Concern?",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 Capabilities*, 18(4): 1-14.
49. Genicot, G. and D. Ray, 2017, "Aspirations and Inequality", *Econometrica*, 85(2): 489-519.
50. Glaeser, E. L., and J. Scheinkman, 2000, "Non-market Interactions", NBER Working Papers 8053, <http://www.nber.org/papers/w8053>.
51. Grossman, M., 1972, *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52. Hearn, D. H., C. K. Halbrendt, C. M. II. Gempesaw, and S. Webb, 1990, "An Analysis of Transport Improvements in China's Corn Sector: A Hybrid Spatial Equilibrium Approach", *Journal of th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Forum*, 31(1): 154-166.
53. Hausmann, R., D. Rodrik, and A. S. Velasco, 2008, "Growth Diagnostics", in Serra N., and J. E. Stiglitz (eds.),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4. Hirschman, A. O., and M. Rothschild, 1973, "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1(12): 544-566.

- 55.Hoff, K., and A. Sen, 2006, “The Kin System as a Poverty Trap?”, in Bowles S., S. N. Durlauf, and K. Hoff (eds.), *Poverty Trap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56.Janzen, S. A., Magnan, N., Sharma, S., and Thompson, W. M., 2017, “Aspirations Failure and Formation in Rural Nepa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39: 1-25.
- 57.Jensen, R., 2012, “Do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Affect Young Women’s Work and Family Decision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2): 753-792.
- 58.Knight, J., L. Shi, and Q. H. Deng, 2010, “Education and the Poverty Trap in Rural China: Closing the Trap”,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7(4): 311-332.
- 59.Kochar, A., 1997,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Rationing Constraints in Rural Credit Markets in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3(2): 339-371.
- 60.Komives, K., D. Whittington, and X. Wu, 2001, “Infrastructure Coverage and the Poor: A Global Perspectiv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551, <https://ideas.repec.org/p/wbk/wbrwps/2551.html>.
- 61.Macours, K., and R. Vakis, 2009, “Changing Households’ Investments and Aspirations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Transfer Program”,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137, <https://ideas.repec.org/p/wbk/wbrwps/5137.html>.
- 62.Manski, C. F., 2000, “Economic Analysis of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3): 115-136.
- 63.Miguel, E., and M. Kremer, 2003, “Networks, Social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The Case of Deworming Drugs in Kenya”,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s*, 46(2): 297-305.
- 64.Pasquier-Doumer, L., and F. Risso Brandon, 2015, “Aspiration Failure: A Poverty Trap for Indigenous Children in Peru?”, *World Development*, 72: 208-223.
- 65.Platteau, J. P., 2006, *Institutions, Social Nor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66.Quaglia, R., and C. Cobb, 1996, “Toward a Theory of Student Aspiration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ural Education*, 12(3): 127-132.
- 67.Ray, D., 2006, “Aspirations, Poverty, and Economic Change”, in Banerjee, A. V., R. Benabou, and D. Mookherjee (eds.), *Understanding Pov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8.Sampson, R. J., and J. D. Morenoff, 2006, “Durable Inequality: Spatial Dynamics, Social Processe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verty in Chicago Neighborhoods”, in Bowles, S., S. N. Durlauf, and K. Hoff (eds.), *Poverty Trap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69.Simon, H. A., 1955,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1): 99-118.
- 70.Simon, H. A., 1979, “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9(4): 493-513.
- 71.Stout, J. G., N. Dasgupta, M. Hunsinger, and M. A. Mcmanus, 2011, “STEMing the Tide: Using Ingroup Experts to Inoculate Women’s Self-concept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00(2): 255-270.

72. Stutzer, A., 2004, "The Role of Income Aspirations in Individual Happines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4(1): 89-109.

73. Wydick, B., P. Glewwe, and L. Rutledge, 2013, "Does International Child Sponsorship Work? A Six-country Study of Impacts on Adult Life Outcom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1(2): 393-436.

74. Yamauchi, F., 2007, "Social Learning, Neighborhood Effects, and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Green-revolution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3(1): 37-62.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部发展研究院)
(责任编辑：毛学峰)

Aspirations, Investment and Poverty: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nalysis

You Liang Liu Jundi Huo Xuexi

Abstract: Tackling poverty in social development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challenge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It also remains a key problem, from a policy decision-making perspective, to sustain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tackle persistent pover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spirations of the poor population as a key to the endogenous dynamical mechanism, and seeks to establish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bsequent investments. It takes investment as the main line of analysis, and creat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spirations-Investment-Poverty". Based on analyz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individual aspirations, the study divides the population below the poverty line into a group with high aspirations and a group with low aspirations. For the former group, the study puts forward the transfusion oriented policy supply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external constraints that restrict capital investment. As to the latter group, the study suggests an increase in aspirations creation policy supply in order to drive people in the latter group to step into to the group with high aspirations, after which the transfusion oriented policy supply can be used to promote their capital investment behaviors.

Key Words: Aspiration; Poverty; Transfusion Oriented Policy Supply; Aspirations Creation Policy Supply